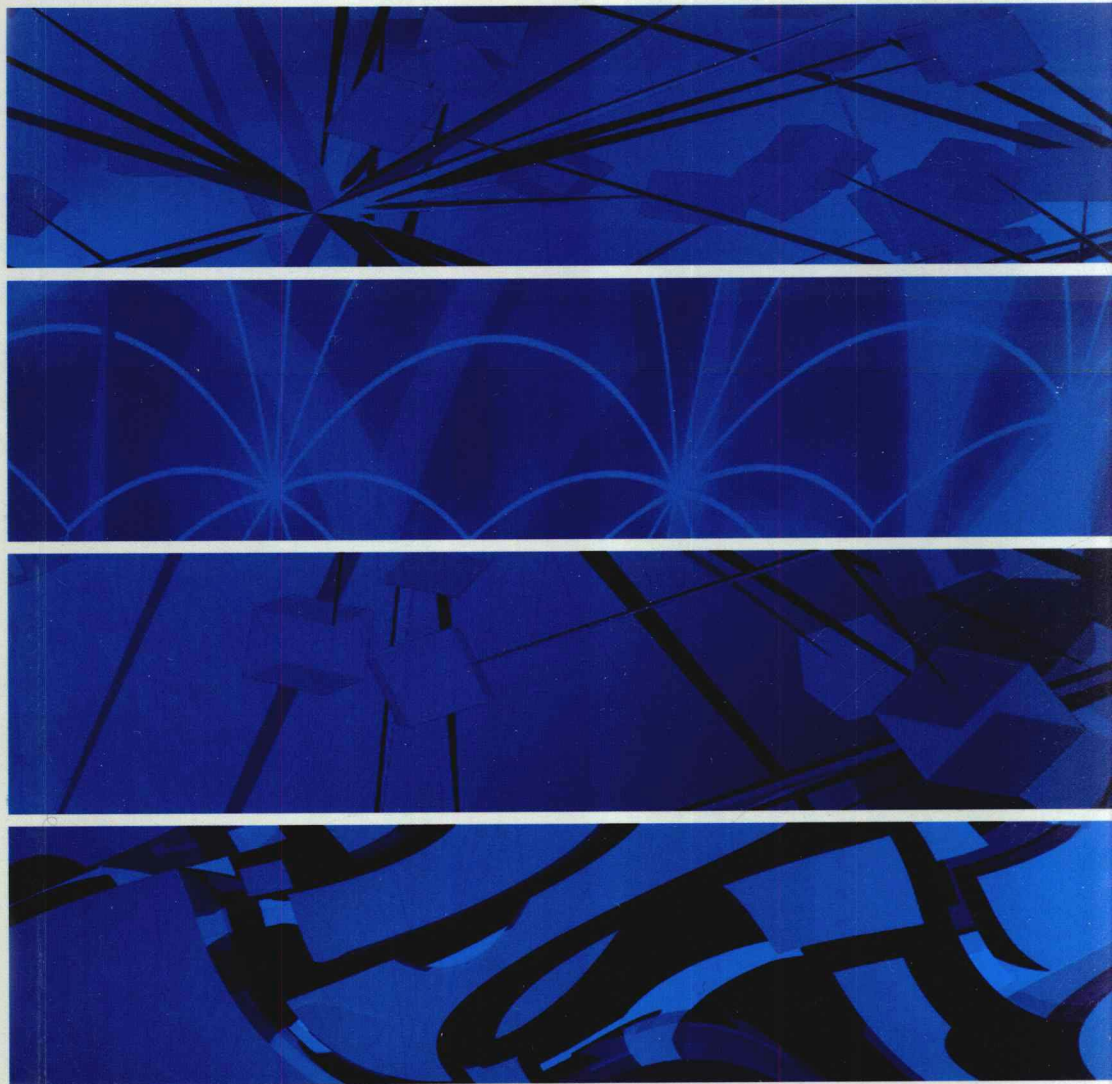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BEN AGGER



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美] 本·阿格 / 著

张喜华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ZUOWEI PIPING LILUN DE WENHUA YANJIU

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美] 本·阿格 著

张喜华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0—1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美]本·阿格著 张喜华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0238-4

I. ①作…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2587 号

© 1992 Ben Agger

First Published 1992

Reprinted 1998

书 名 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著作责任者 [美]本·阿格著 张喜华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张子言成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动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都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著,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20 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及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译者序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本·阿格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父亲曾任教于俄勒冈大学，教授政治学。他 17 岁时移居加拿大，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获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当今活跃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对后现代主义尤感兴趣。本·阿格写作勤奋，著述颇丰，已经出版 17 部著作，涉及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诸多方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本·阿格有关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阐释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路径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文化研究应走怎样的路径

在英语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伯明翰学派”。当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开始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以往法兰克福学派不甚关心的通俗文化和媒体展开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有一条鸿沟，作为有着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左派”学者，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仅仅是研究而不是真正进入工人阶级的生活。无论是早期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还是后来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都是英国

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都受到法国理论,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理论,加上一些后现代主义媒体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理论路径虽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在理论上反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现实的层面并没有投身到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去。

我们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之一,而新马克思主义却从生产与消费这组范畴出发讨论问题。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环节。他们把文化生产看做是生产方式之一,这个理论路径决定了他们把文化从上层建筑重新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加上他们注重消费的问题,因为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都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这套理论从欧洲大陆迅速扩散到北美,首先是在美国大学里的媒体理论界、大众传播系等研究和运用。这一理论迅速与美国学界的左翼结合起来,而美国学界的左翼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左翼已很不相同,他们更关心诸如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等现实问题,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后资本主义,如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包括后殖民主义等等。

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文化研究已经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他们把研究的视角投向诸如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日渐繁复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注意到大众文化、媒体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种族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建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他们接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早期文化主义在方法上相对的结构主义方法。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的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总结了这两种研究倾向,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改变了笛卡儿、康德的主体哲学所确立的“自我”,他认为这个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个神话、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象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

念启发文化研究者分析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对个人记忆、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成为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此时,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重读,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葛兰西曾经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霸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做出的妥协与让步。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激活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而将二者综合起来并出色地发挥运用的正是霍尔,他的成果影响了各国的文化研究者,也影响了本·阿格。

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化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当今欧美学者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把文化研究仅仅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形式,更脱离了无休止的概念界定的窠臼。本·阿格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路径下开展文化研究的。他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明白无误地提出:“……批评性见解和实践的制度化常常带来这种趋势,但它也存在去除这种危险的潜在因素。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文化研究者,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和关涉政治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我还是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感到沮丧,这种趋势就是:为了解读没有真正政治根基的文化文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方法论。这正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文学院系被变成解构主义的命运。确实,我一贯回避文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这种美国化了的后结构主义,我对这种

文化研究方法感到失望……”^①他在该书中还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中心见解之一就是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程序化的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和明确的批评话题。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别日渐削减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无处不在。因此，文化研究拒绝对其关注的文化产品经典化，从科学到科幻，没有经典，只有异质文化形态。这股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扭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趋势。”^②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方法模式，同时去挑战忽视其他文化形式存在的主流文化，恰恰是本·阿格等学者竭力倡导的研究路径。

这样看似激进的研究路径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只探询文化的差异，不再关心文化的共性，恰恰相反，本·阿格所强调的只是文化研究“没有先决的方法论”。作者显然已经预料到会有人指责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严格理由的文化阐释混杂方式，但作者显然更希望人们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能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政治参与，^③这是作为一名左翼学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本·阿格无意于讨论什么是文化这样一个亘古的、带有经院哲学意味的古老话题，而是通过梳理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各种共性问题，全面论述了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核心问题。

二、文化研究应去中心和去经典

本·阿格认为文化是一种贡献社会知识的表达活动。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观念的扩展影响了流行文化的概念化方式，流行文化被概括为日常实践活动的一个庞大整体，这些日常活动是不在狭义定义的传统官方文化规定的范围之内的，又影响了科学概念化为文化话语本身的方式，为此他提出应当扩展文化概念的范畴。他认为：“文化概念的扩展和文化关联性的强化背后的主要动力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

^{①②③}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p. 1~2,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技术的彻底转型,尤其是那些影响了婴儿潮人群的信息技术转型,这群人既是文化生产者,又是文化消费者。电视一代从情景喜剧、各色表演和政治灾难报导中接受文化信息……电视、电影和摇滚乐与日俱增形成的影响与传统家族观念对孩子们价值和行为的日渐消退的(或好或坏的)影响形成鲜明的对比。流行文化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残余的传统高雅文化,比如古典音乐,要么是由于40岁以下的人群很少光顾而行将消逝,要么就转换成了‘流行’节目。”“较之以前,更多的事物被归结到了文化的名下,因为电子媒体已经把地球变成了麦克卢汉假定的‘地球村’。虽然应该抵制技术决定论和现代主义影响的论点,但是仍不可忽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关键政治因素的电视化民众生活。”^①

本·阿格在本书中提出了文化的去中心和去经典问题。“……我们也必须要以一种根本挑战精英主义的方式来为文化合法性去中心”。“文化去中心化是一种政治行为,极大地促进了权力和财富的去中心化。它是对主导秩序的根本挑战”^②。他还认为,“企图扩大经典,无论自我意识的参与程度如何,本质上都是政治行动。至少,它在挑战主导经典的优势地位及其管理的教育机构”^③。针对西方大学的现状,他认为,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企图挑战传统课程和学术评价模式,以便为不同的声音和方式制造空间。这种制造空间的活动有助于将大学对那些迄今还被拒于校门之外的人开放。这种制造空间的活动本身就是某种大量文化研究工作支持的政治工作。

文化的去中心、去经典是否会导致文化研究出现民粹主义呢?本·阿格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去中心、去经典是本·阿格所讨论的各种各样文化问题的核心,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流行文化的低俗和操纵性,而且把流行文化当成解放动力的源泉。有一个关于文化研究强大的民粹主义,它抗拒各种形式的精英主义,有时还反对自身利益。“在文化研究运动中,人们不能夸大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文化评价标准本质上的重要性。当然,显而易见,阿多诺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现成的批

①②③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 3, p. 11, p. 12,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评目标：据说他藐视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文化的激进行为和奢侈，把爵士乐当成法西斯进行曲随意解散。我不是阿多诺武断审美判断的捍卫者。但关键是不要隐瞒围绕流行文化问题的不同文化研究方式之间的真正差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就流行文化的救赎可能性方面的耐心比伯明翰学派、德里达和女性主义方法要少得多。这并不是说，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缺乏对流行文化的分析，正是他们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使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当时，他们拒绝认可偶尔繁荣的流行文化。总之，他们不是民粹主义者”^①。显然，本·阿格的立场是辩证和客观的。他准确地认识到，民粹主义者与德里达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流行文化是否包含某些解构，因而在政治上进步的趋势问题。在法兰克福理论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谴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管理(total administration)巅峰的文化工业，而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大体上认为这一尖锐的指责没有太多的差别。相反，他们认为，正常人不仅看透了消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霸权阴霾，而且一些人还以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值得仿效的语境积极斗争，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日常生活根本不予理睬，除非注意到日常生活受到明显的外部 and 内部的必要事件的操纵，这显然是有缺陷的。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应有立场

作为一名西方左翼学者，本·阿格在本书中提出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关于工人劳动力剥削的理论，还是关于所有统治、压迫及剥削问题的更为普遍的理论？法兰克福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批判理论，而非文化理论。他们没有给予阶级统治特权，而是将统治的源头和深度追溯至划时代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实现了对客观他者的征服，客观他者既是自然也有他人。这是《启蒙辩证

^①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 15,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法》中展开的讨论,可能也是法兰克福批评理论最重要的言论。”^①本·阿格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艺术必须以某种方式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斗争中的利益服务——即便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可能都是错误的。卢卡奇的这一言论是不可能正确的。对于解构文化研究而言,不存在什么“站在之外”:文化批评不仅仅是表述性的,更是建构性的。批评家通过批评已经在改变世界,创造和再创造文化。意识形态批评如果不是充分的文化实践,至少也是一种政治实践。试图从外部提供文化启蒙的文化艺人和批评家不能简单地为无产阶级代言。文化批评和文化生产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这就迫使批评家不能简单地站在历史之外假定一个坚不可摧的基础,而要以一种承认历史性和可误性的方式为个人宣称的基础进行论证。

本·阿格看到了卢卡奇错误地将无产阶级泛化为世界历史的同一主客体,从而忽略了解放运动的其他力量。为了使正在建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不再无可救药地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反思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形式和动因的设想。这并不是像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要解散无产阶级,而是鉴于 1883 年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在世界及精神领域的发展,要鼓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再思考。

从这一理论路径和思想方法出发,本·阿格指出,“如今,我认为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派特征的观点在左派学者中随处可见。但是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阶级,还涉及种族和性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文化评价运动中来,他们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表述他们的遭遇,以正确的政治论断来评价文化作品的真实性。通常,艺术家也来自这些严阵以待的队伍,他们的作品被当做是无权阶级发出的声音。这就导致了从文化作品描绘的特定的主体角度出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化、专业化以及族裔聚居:女性艺术和有色人种艺术(除了阶级艺术之外,如最初的日丹诺夫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本质上,这些主张都认为能够从

①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p. 53~54,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外部按政治真实性的或者文化理论正确性的某种机械需求的观点来评判文化。尽管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从非白人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都将自己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但他们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仍然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评价标准。尤其是,他们试图站在文化历史之外,从他们政治诚信角度去评价有争议的作品,这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初方案”^①。由此,本·阿格不仅深化了卢卡奇的思想学说,提出了建构文化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研究确实要有“阶级意识”,但又要超越“阶级意识”。本·阿格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要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将文化研究政治化就意味着人们能进行无政治意义的文化研究,就像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一样,政治也是悄悄渗入到文化之中的。那种假设认为本质上为实证主义立场的文化实践不是文化政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解读都是文化创造行为。这既是建立他所说的文化政治学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应有立场。由此也不难看出,本·阿格的上述理论在卢卡奇的思想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四、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

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一直是学术界颇感头痛的老问题。本·阿格明确提出:“文化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传统学科不以融入批评理论、文学理论、话语分析、妇女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流行文化。传统的学科束缚人们去追求文化研究学者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如从电影理论到书籍出版的政治经济。当然,跨学科是一种时尚,至少 10 年前就已经是一种时尚。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期刊和课程与日俱增。虽然很多都只是停滞不前的学术界鸡毛蒜皮的改头换面,但是,没有理由拒绝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努力尝试,这是目前酝酿着的最富有成效的跨学科项目。”^②作为一个激进的左派

^{①②}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 55, p. 17,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理论家,本·阿格提出,政治上最有效的文化研究工作是从学科内部“解构”学科,撇开别的学科去质疑其本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内部发掘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可以采取文化研究的视角,挑战各种占主导地位的但又各不相同的从文本客观性到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的假设。“这里是一点忠告:文化研究拒绝成为僵化的程序,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其认识论标志。因此,没有单一的或静态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同样适用于跨学科或学科内部。但这也是文化研究利弊相从的所在”^①。本·阿格试图证明的是学院化的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最终致命地偏离了政治参与,这是和他的左翼政治立场相左的。

本·阿格并不赞成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所恪守的所谓“相对主义”立场,作为一名西方左翼学者,他明确提出要建构“文化政治学”,“我拒绝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号或者一门全新的学术学科的趋势,尽管批评性见解和实践的制度化常常带来这种趋势,但它也存在去除这种危险的潜在因素。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文化研究者,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和关涉政治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我还是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感到沮丧,这种趋势就是:为了解读没有真正政治根基的文化文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方法论。这正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文学院系被变成解构主义的命运。确实,我一贯回避文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这种美国化了的后结构主义,我对这种文化研究方法感到失望……”^②他更倾向于建立一种更具政治实质性的文化研究方法,为此他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研究确实要有“阶级意识”,但又要超越“阶级意识”。本·阿格认为,政治是悄悄渗入到文化之中的,那种假设认为本质上为实证主义立场的文化实践不是文化政治。他还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解读都是文化创造行为。这既是建立他所说的文化政治学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应有立场。

①②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 19, p. 1,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五、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文化问题

作为一名当代西方学者,本·阿格更善于体察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特别是他敏锐地发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正是在对待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分道扬镳了。后现代主义(如利奥塔和福柯)和后结构主义(如德里达)为此互相对立。“利奥塔和福柯加入实证主义者行列,按照福柯的说法,文化批评家不可以在自己的话语和实践之外来对散漫的实践进行评判。利奥塔坚持话语/实践的相关性和不能比较性,这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奠定了基础。这与实证主义的观点基本类似,实证论者认为文化批评不可以试图将自身的价值和评判强加给文化作品和实践,相反,文化作品和实践应该根据其自身意义从内部予以估价。然而,德里达派对此持有异议。他们挑战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断言:他们认为所有分析同时也是批评,所有的阐释就是干预,因为他们介入了选择性,体现了视角。艺术批评家强调个体艺术家作品的各个方面,将作品与他/她自己的批评兴趣融合在一起。影评家注重对电影风格的批评,而风格完全是个人一时兴趣的问题。书评家也不是简单地评论整个文本(不管文本所指为何),而是以批评讨论的方式,极具选择性地决定他/她要主题化的内容”^①。本·阿格指出,后结构主义者否认公正的文化评论和批评出现的可能性,他们强调话语/实践的可评价性,即便不是终极决定性。他相信人们能跨越文本差异,进行互文性的阅读和书写。试着重译话语/实践,发掘出它们的疑难逻辑对于德里达的解构至关重要。通过翻译话语/实践,人们能够认识到表述行动中几乎不可能做到清晰明朗,但同时也能发现语言的可重复性和灵活性搭建了对话的桥梁。“这并非对客观性的否定,而是认识到每个主观性都已经具有了客观性——即便不是相同的客观性。主体建构客体,

^①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 137,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这是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主要经验之一。阅读是书写的一种形式”^①。

当年,伯明翰学派不是把媒介看成仅仅是国家用以维护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再把受众当做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威廉斯等人的影响下,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对电视媒介和电视观众的消费进行了研究。显然是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本·阿格还以欧美流行的电视评论为例,指出:“实证主义电视批评几乎不质疑电视全面的社会作用,更不去解构性地追踪荧幕背后原始的文学和编辑建构。这些光鲜表述背后的建构隐藏着文学和编辑策略,这些所谓的产品价值巧妙地隐藏着繁多的文学手段,使电视自然地呈现于观众面前。电视是我们世界的社会地质学的一部分。有些批评家强化了这一印象,他们只关注电视表面清晰度,完全没有触及暗藏着的作者建构实践,这些实践是有趣的方式,文化意义以此方式潜藏在文本之下。”^②假如我们指的文化评判意味着批评对批评客体的积极介入,那么文化评判就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后结构主义,称赞“后结构主义将我们从无预设的表述幻觉中解放出来。描述电影或小说已经参与了评判,即便其阐释性语言完全没有评判性形容词。批判被编码进入阐释中,在阐释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在实证主义批评中,还是在更为自我意识的后结构阅读中,阅读都同样地改写书写”^③。他在赞赏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的同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坚守的实证主义文化分析立场政治性不强。其实,这些传统已经变得高度技术化,看不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政治介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学术和知识文化批评家克服障碍的问题。“尽管实证主义批评家有时候对其文化客体做出个人评价——典型的大众市场文化的批评的赞成或反对姿态——对

①②③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p.138, p.138~139, p.139, London, The Falmer Press,1992.